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一潭死水？誰是打破僵局的人？

當前，我們似乎正置身於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放眼世界，自由民主的退潮與威權專政的崛起交織成一片壓抑的暗色。即使在被視為民主堡壘的美國，我們也正目睹著令人不安的異象：新聞自由遭受威脅，學術的獨立性被政治意志所干擾，甚至連司法體系也隱約淪為打壓異己的工具。令人費解的是，即便如此，仍有相當比例的民眾、乃至福音派教會，在政治偶像的感召下選擇了盲從與狂熱。

在俄羅斯，普京對烏克蘭為所欲為，澤連斯基要修復失地的希望顯得渺茫；在國內，俄羅斯的反對派，不是身陷牢獄，就是離奇死亡。但普京仍然是多個國家的座上賓，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甚至說普京不是獨裁者。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由經濟發展到政治革新的改良主義曾經被寄予厚望，但在愈發嚴苛無情的鐵拳下顯得蒼白無力，流亡於海外的反對力量陷入分裂與消沉。這一切，構成了一個看似無解的僵局，一潭激不起半分漣漪的死水。

然而，當我們撥開現實的迷霧，翻閱人類文明的編年史，便會發現一個奇特且充滿辯證色彩的規律：打破僵局的人，往往正是製造僵局的人。那些試圖將國家意志與個人野心劃上等號的威權領袖，其性格中無一不帶有「自我無限膨脹」的基因。他們在一次次的權力博弈中取勝後，往往會產生一種身負「天命」、戰無不勝的幻覺。在他們構建的權力場中，恐懼與利益交織，使得身邊的策士與幕僚逐漸噤若寒蟬。為了自保或求榮，這些人

不再提供客觀的情報與逆耳的忠言，而是極力營造一個充滿奉承的「回音室」。在這種絕對的資訊隔離中，領袖的雄心壯志最終演變為致命的狂妄。

歷史反覆證明，這種「回音室」效應必然導向災難性的戰略誤判。而對於一個封閉且超穩定的威權體制而言，這種來自頂層、規模宏大的誤判，在多數情況下會產生足以撼動根基的震盪。這種誤判的代價雖然沉重，但往往也是領袖親手為自己挖掘墳墓、為僵局帶來終結的時刻。以下，我將透過納粹德國、日本帝國與共產蘇聯這三個歷史斷點，來審視這種「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的必然軌跡。

納粹德國：從不戰而勝走到兩面受敵的自焚之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打前夕，希特拉其實已經在外交與不流血衝突中獲得了近乎完美的勝利。透過1938年的「德奧合併」（Anschluss）以及同年9月與英、法簽署的《慕尼黑協定》，希特勒成功吞併了蘇台德地區，並隨後在1939年3月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當時英、法的「綏靖政策」已讓德國坐穩了歐洲霸主的位置。如果希特拉在此時止步，利用掠奪來的工業資源鞏固內部，納粹體制在歐洲的統治極可能延續數十年。然而，被勝利沖昏頭腦的希特拉卻繼續侵略，將魔爪伸展到波蘭，最後挑起了二次大戰。

1939年8月，德國與蘇聯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這是一步極其精明的戰略棋子，它讓德國在閃擊波蘭並橫掃西歐時，徹底解除了東線的後顧之憂。1940年6月法國投降後，德軍確實勢如破竹。當時英國孤立無援，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然而，獨裁者的貪得無厭與對意識形態的執念（將斯拉夫民族視為「劣等民族」，將蘇聯視為「生存空間」），讓他做出了二戰中最重要的愚蠢決定，1941 年6月22日希特拉發動「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全面入侵蘇聯。他完全忽略了1812年拿破崙在俄羅斯極寒氣候與漫長補給線下的悲劇性失敗。當時德軍在西線仍與英國及隨後參戰的美國對峙，入侵蘇聯意味著德國被迫陷入其軍事將領最恐懼的「雙線戰爭」。這場誤判導致了連鎖反應，蘇聯廣袤的戰略縱深與堅韌的抵抗（特別是在1943年史太林格勒戰役後），徹底耗盡了德軍的精銳力量。到了1945年4月，由於德國國無法支撐兩面戰場的龐大消耗，美、英、法盟軍與蘇聯紅軍分別從東西兩路合圍德國，最終在易北河會師，納粹德國徹底灰飛煙滅。

日本帝國：從亞洲之光到毀滅性豪賭

日本帝國的崛起曾是近代史上的奇蹟，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透過大幅度的體制改革，在短短幾十年內從封建社會跨越到工業強國之列。到了20世紀初，日本在經濟與技術領域已穩居亞洲第一，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豐田佐吉於1924年發明的「G型自動織

布機」，其效率與自動化程度在當時超過了英美技術，甚至讓英國紡織巨頭普拉特公司（Platt Brothers）不得不反向購買專利，這象徵著日本已具備了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工業根基。

在戰略版圖上，日本透過多次軍事冒險，早已獲得了豐厚的紅利，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滿清，通過《馬關條約》 取得台灣與澎湖，1910年正式又併吞了朝鮮半島，1931年「九一八事變」 後甚至控制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當時的國際聯盟面對日本的擴張，除了發表軟弱的《李頓調查報告》外，根本無力實施實質性制裁。日本當時已經坐穩了亞洲霸主的寶座。如果當時的日本決策層能止步於此，消化既得利益，日本帝國的體制或許能維持更長久，可能今天朝鮮、台灣、東三省仍然是日本的一部份。

然而，被以往勝利沖昏頭腦的軍部（特別是關東軍與激進的少壯派軍官），對中國採取了得寸進尺的政策，日本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令自己軍隊陷入泥沼。但最愚蠢的決定莫過於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以工業產能而論，美國在鋼鐵與汽車等關鍵產量上遠超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更是完全不在同一個量級。日本高層明知美國的國力凌駕於己，卻寄望於透過一次突襲挫敗美國的戰鬥意志，這在戰略上簡直是自殺行為。這次襲擊徹底終結了美國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情緒，最後，1945年八月兩枚原子彈終結了日本「大東亞共光榮圈」的春秋大夢。

紅色蘇聯：由二戰後的巔峰走向戰略紅利的浪費

1945年的蘇聯，其國際地位處於沙俄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頂峰，它不僅是打敗納粹德國的功臣，更在東歐建立了廣大的衛星國屏障。由於美國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義傳統，美國政府正承受著巨大的民意壓力，人民要求「讓孩子們回家」，美軍在海外的大規模復員已經是板上釘釘。

若史太林當時選擇採取一種防禦性的姿態，專注於戰後重建，並與西方維持基本的合作框架（如《雅爾達協議》所設想的），美國很可能不會長期大規模駐軍歐洲，冷戰的鐵幕也未必會如此迅速地落下。然而，史太林對安全感的病態追求轉化成了攻擊性的擴張，這直接激發了西方的生存焦慮。

1948年的柏林封鎖是第一個重大的「愚蠢決定」。史太林試圖透過切斷地面交通，將西方盟軍逼出西柏林。這場豪賭徹底失敗了，封鎖不僅促成了美國的「柏林空降」，更讓原本對重整軍備猶疑不決的西歐國家與美國緊密結盟，直接導致了1949年北約（NATO）的成立。

韓戰更是蘇聯戰略史上最大的敗筆之一，史太林默許金日成入侵南韓，原本是想在遠東試探西方的底線。在韓戰之前，美國的國防預算正被大幅削減，其防禦圈甚至未將台灣

與韓國納入。但韓戰爆發後，美國通過了 NSC-68 號文件，國防開支在短時間內翻了三倍。為了應對美國的動員，蘇聯不得不將極大比例的國民生產總值投入軍工複合體。這種「大炮代替黃油」的結構性傾斜，為後來蘇聯民生經濟的僵化與崩潰埋下了伏筆。

蘇聯在1960與70年代對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是一種典型的「戰略過度擴張」。蘇聯在非洲、中東、拉丁美洲投入了天文數字的物資來支持各種左派政權，這些支出與回報完全不成正比，反而掏空了蘇聯的經濟根基。1979年入侵阿富汗則是最後的斷頭台，這場十年的消耗戰讓蘇聯財政崩潰，也讓軍隊對體制產生了嚴重的懷疑。1991年蘇聯解體，其來有自，這是對意識形態的執着和缺乏自我調節機制的惡果。

結語

歷史不提供時間表，也不保證結局；它所能揭示的，僅是某些權力結構在特定條件下反覆出現的高風險路徑。縱觀歷史，人類文明曾無數次陷入看似永無止境的暗夜。當我們回首那些歷史的橫切面，悲觀情緒的瀰漫確實有其沉重的理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號稱世上最堅固的法國瑪奇諾防線在德軍的閃擊下形同虛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短短六週內崩潰，英軍殘部在鄧寇克的沙灘上經歷了屈辱的撤退；在亞太戰場，日本零式戰鬥機奪取了絕對的制空權，英國在馬來西亞的防線竟然在十周內徹底崩潰；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太平洋艦隊元氣大傷，即便到了關鍵的中途島海戰前夕，日本海軍在艦隊規模與作戰經驗上仍佔據絕對優勢，從當時的角度看，盟軍似乎毫无勝算。

這種令人窒息的壓抑感同樣延續到了冷戰時代。蘇聯的坦克無情地碾碎了1956年「匈牙利之春」與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民主訴求，美軍在南越的熱帶雨林中疲於奔命，最終在1973年撤離，1975年西貢淪陷，隨後红色高棉席捲柬埔寨。如果只停留在這些瞬間，人們很容易相信強權將永遠主宰地球。

然而，歷史並非靜止的快照，而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擴張與統治，往往同時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獨裁者的狂妄、回音室的遮蔽、以及對人性渴望自由之本能的蔑視，最終都會轉化為戰略上的致命誤判。納粹德國的雙線潰敗、日本帝國的不敗神話、蘇聯體制的內部坍塌，無一不在證明：沒有任何一種建立在壓迫與虛假之上的秩序可以永恆。無論黑夜顯得如何漫長且難熬，它都無法阻止太陽照常升起。

當我們在最深的谷底仰望，請記住：嚴冬即便封凍了每一寸土地，也無法阻擋春意在凍土之下潛行。星光之所以在今夜顯得清冷，正是因為它在為即將到來的黎明守靈。歷史從不真正終結於一潭死水，它總是在最黑暗的轉折處，為那些不曾放棄希望的靈魂，預備了一場宏大而必然的破曉。《舊約聖經・哈巴谷書》三章17節是最黑暗時刻的寫照：「無

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但跟着的一節才是重點：「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2026年2月4日

後記：

頗具爭議性的戰爭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發動「史詩級憤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大規模空襲伊朗，這軍事行動頗具爭議性，例如特朗普在沒有國會授權下出兵海外，亦沒有諮詢北約盟友，而且美國民意調查顯示大部份人民並不支持這場戰爭，故此我需要聲明，一方面我同情長期受到壓迫的伊朗人民，但另一方面我對特朗普的手段持保留態度。自戰爭爆發以來，媒體的評論已經鋪天蓋地，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看伊朗政權的興起與衰亡。

在這次行動中，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被擊斃。伊朗官方隨後證實其死亡，並宣布全國哀悼，但在世界各地，一些長期流亡海外、反對伊朗神權政府的伊朗僑民卻走上街頭歡呼，認為這可能象徵著神權體制的終結。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出現反戰聲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伊朗裔記者兼社運人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公開要求反戰的紐約市長曼達尼（ Zohran Mamdani）閉嘴，不要評論伊朗戰爭，她認為這種聲音忽略了伊朗人民長期在神權統治下所承受的壓迫。

眾所周知，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伊朗社會多次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例如2009年綠色運動、2019年油價抗議、及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運動，還有最近的抗議活動。這些抗議往往遭到強力鎮壓，人權組織估計造成數百甚至上萬人死亡，數千人被拘捕。就最近的示威抗爭，伊朗政府只承認約三千人死亡，但伊朗人權活動家通訊社認為受害者人數約為二萬。這些事件顯示伊朗神權體制在國內的合法性正逐漸被侵蝕。

誰是打破伊朗僵局的人？

要理解今天的伊朗局勢，必須回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當年高美尼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以宗教領袖為最高權威的神權國家。那時候部分西方知識分子，包括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對這場革命寄予厚望，認為它代表了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的新政治模式。

然而，革命後不久，美伊關係迅速惡化。1979 年 11 月，伊朗學生佔領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五十二名外交人員與工作人員，起初美國政府以為這危機很快會解決，伊朗政府會迅速介入，勸阻學生的激進行動。然而，伊朗政府竟然推波助瀾，將美國人質扣押了444天，結果伊朗將自己變成了流氓國家。

在1980至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伊朗曾動員大量青少年志願者參與前線行動，其中部分人被派往極為危險的任務，例如清除地雷區域。伊朗官方宣傳將這些犧牲描繪為宗教殉道，這種做法在國際社會中引發強烈爭議。

在地緣政治方面，伊朗作為中東最大的什葉派國家，長期試圖在地區擴張影響力。伊朗輸出革命，並支持多個武裝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以及也門胡塞武裝。這些政策使得以沙地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國家對伊朗高度警惕，雙方在中東多場衝突中形成代理人競爭，例如敘利亞戰爭與也門內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與以色列其實保持著相當密切的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兩國既沒有領土爭議，也缺乏歷史仇恨。然而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將反以色列提升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並通過支持多個武裝組織，試圖在戰略上包圍以色列，甚至多次揚言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

簡單地說，伊朗神權政府在過去四十多年中逐漸形成一種高度對抗性的外交格局：一方面與美國和西方世界長期敵對，另一方面又與多個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保持競爭甚至對立，並且多次威脅和恐嚇以色列。在最近的戰事中，伊朗無差別地攻擊卡塔爾、阿聯酋、沙地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令美國與這些盟友更加敵愾同仇，今天伊朗已經落入了四面楚歌的局面，這是獨裁政權的宿命！

2026年3月7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